

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一九二一～一九二四)

陳 三 井

- 一、楔子
- 二、家世與早年教育
- 三、留學日本與參加五四運動
- 四、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 五、結語

一、楔 子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巴黎市政府在巴黎十三區靠近義大利廣場(place d'Italie) 的戈德弗魯瓦旅館(Hôtel Godefroy，位於 Godefroy 街十七號) 牆上，為周恩來塑立了一塊方形的半身銅匾，並於其名字底下鐫刻一行字，載明周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留法期間曾住過此處(Habita cet immeuble lors de son séjour en France de 1921 à 1924)，這家小旅館不僅周恩來等人租住過，也是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所在地；更是其機關刊物——「少年」、「赤光」的編輯所。巴黎市政府為周恩來塑立銅像浮雕，是在周死後三年多的事情，當時周的遺孀鄧穎超及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均曾應邀到場觀禮。

我們知道，周在法國停留期間，從事勤工儉學為時甚短，主要與蔡和森、趙世炎、陳毅等人從事政治活動，領導示威遊行，由於擾亂社會秩序，為法國社會製造不安，曾被巴黎警察總局列為「危險人物」之一，幾乎遭到驅逐^①。事隔五十多年之後，法國當局如此做法，是不是意味法國重新肯定周恩來在法國的一切所作所為？抑或僅僅是一種現實的外交表態？個人以為，法國政府或民間團體若有意為中國人立碑塑像，首先應考慮三位提倡勤工儉學的領導人物——蔡元培（子民）、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他們無疑才是法國人的真正朋友，至少是中法合

^①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下，頁五三。

作教育的原始發起人和有力推動者。

周恩來從一九二〇年年底出國，至一九二四年八月返國，在歐洲停留約四年左右，先後住過倫敦、巴黎、柏林，經常奔走於法、德、比之間。雖然到目前為止，他的行踪與活動仍有若干無法解開的謎，但是他的存在與參與，關係到整個勤工儉學運動的趨向和歷史發展，關係到中共在歐洲黨團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更關係到中共與無政府主義者及中國青年黨之間在巴黎的思想和行動鬭爭。所以說，周氏旅歐期間雖短，但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層面卻相當廣泛，而且具有複雜的多樣性，尤其無論任何一方面都居於一種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而過去一些有關周恩來的傳記或論文，或由於資料所限，或因立場關係，對於他早期旅歐時期的種種活動，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錯誤不少，或不够客觀，因此有加以重新探討的必要，這是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動機。

二、家世與早年教育

關於周恩來的生年，過去中外文著作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根據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青少年時代紀事」^②，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而與李天民^③、嚴靜文^④、唐國英^⑤等人所說的一八九九年稍有出入。原籍浙江紹興，從祖父那一代起始遷居江蘇淮安，所以周是在淮安出生，也算得上江蘇人。這一點包華德（Howard L. Boorman）所編的「民國名人辭典」^⑥，正好弄反了。

周家無論在紹興或淮安，都算得上地方大戶，人丁興旺，房屋田產不少，而且一門三舉人一秀才，但不久即面臨廢科舉、辛亥革命等大變局，家道逐漸中落。

周之祖父周鑾龍（雲門），先在淮安縣當師爺，後任知縣，共生七男一女。周父劭綱（懋臣）排行最小，能力也較差，師爺未曾當上，只做過財政廳、縣府收發、文書之類工作^⑦。母萬氏，為淮陰知縣萬青選的女兒，工琴棋書畫，尤善繪仕女，是個才女。

②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人民出版社），第十五輯（一九八一），頁二。該「紀事」由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室參考周恩來全部資料、南開同學錄及各種報刊雜誌編寫而成，史實大體可信。

③ 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六十五年），頁一〇。

④ 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頁一二。

⑤ 唐國英，周恩來初期的政治活動，東亞季刊，十卷四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頁一一。

⑥ Haward L. Boorman(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 p. 391.

⑦ 胡華等著，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〇。

周排行老大，下有兩個同父異母弟弟。早歲喪母^⑧，過繼給二伯父^⑨，由二伯母撫育長大。幼年常住外祖父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

一九一〇年，周十二歲，值辛亥革命前夕，隨四伯父（任奉天省度支司制用課主稿）到東北任上，先就讀鐵嶺銀崗書院，不久轉學，就讀瀋陽東關模範小學^⑩，小學教師介紹他閱讀章太炎主編的「國粹學報」與梁啟超創刊的「新民叢報」（一九〇二～一九〇七），兩者使他在中國文字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⑪，也使他接觸到若干新學，開闊了眼界。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周十五歲，到天津，八月考入南開中學（四年制，為張伯苓於清末所創辦），編入丁三班^⑫，比胡光廉、吳國楨、梅貽寶等人高一班^⑬。周在南開就讀期間表現不錯，尤其作文成績甚受校長賞識，曾得全校作文會考第一名^⑭。除功課出色外，周也是個活動力極強，喜歡參加各項課外活動的活躍份子，茲舉其較特殊者如下：（一）與同學共同發起組織「敬業樂羣會」，並創辦「敬業」月刊，他擔任副會長兼智育部長及「敬業」月刊的總編輯，曾撰俠義小說「巾幘英雄」發表；（二）他同時是學生會刊物——「校風」週刊的總編輯，曾撰寫許多健全團體、改革社會，求國家進步的文章；（三）為紀念南開學校成立十一週年，他曾參加話劇「一元錢」^⑮的演出，當時風氣未開，社會上沒有男女同臺演戲的習慣，而南開又只有男生，所以周飾演女主角孫慧娟，穿祺袍演出，轟動一時；（四）他代表南開中學，參加天津校際演講比賽，獲得兩次第一名；（五）在班運動會上，他參加跳高獲得季軍，其所參加的勇隊，在籃球和排球比賽中均獲得冠軍，堪稱運動健將^⑯；（六）民國四年，當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時，周曾在學生團體集會上發表演說，強烈反對日本強加給我國的亡國條約，反對軍閥政府借外債打內戰，以後他也反對袁

⑧ 周恩來究竟幾歲喪母，亦是衆說紛紜。嚴靜文說是四歲（周恩來評傳，頁一三七）；胡華等則主九歲（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頁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頁三）；許芥昱(Chou En-lai, p.5)，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〇）等則未做確定。

⑨ 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〇。

⑩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

⑪ 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一。

⑫ 同前註，頁一四，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另作已三班，參閱十五輯，頁六。

⑬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一八十自傳（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六。惟胡光廉生於一八九七年，他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即考入南開中學，應比周高兩班。參閱胡光廉，波逐六十年（新聞天地社，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再版），頁七五。

⑭ 胡華等，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頁八。

⑮ 「一元錢」，一名「炎涼鏡」，指出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使得「神州昏暗，天地為愁」。原著出之俄國虛無黨人 Sergei Kravchinski，由周作人據英文本，譯成「一文錢」，刊於「民報」第二十七期。參閱朱泓源，民報的革命理論（臺大博士論文，七十三年六月），頁三六及頁四二五。此劇後甚為出名，多為相聲演員演出。

⑯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一八。

的稱帝^⑦。

三、留學日本與參加五四運動

民國六年六月，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畢業，時年十九歲。同年秋，他東渡日本留學，周在日本居留前後二十個月的生活費用，不由家庭供給，而是由他的朋友五位官費生每人每月津貼十元來維持的^⑧。他先在東京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習日文，同時至早稻田、日本大學旁聽，兼補大學功課，預備投考東京高師，翌年三月應考未取。後來應同學之邀移居京都，準備入京都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亦未如願。

民國六年前後的東京，並不是一個可以靜心讀書的地方，因為二十一條之後，中日關係惡劣，留日學生不是輟學回國，就是組成各種團體，從事政治愛國活動，其中最大的團體是「新中學會」^⑨。周恩來也參加該團體的活動，無心向學，逐漸對數學、理化等課程疏遠，而熱心追求新的事務，大量研讀社會科學的書刊，尤其受河上肇的影響甚大。河上肇是京都大學的經濟系主任，當時是日本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傳播者，曾於一九一七年出版「貧乏物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辦「社會問題研究」半月刊。周成為該刊的熱心讀者，除了「貧乏物語」外，並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界利彥創辦的「新社會」等書刊。此外，他還讀了介紹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這一切開闊了他的眼界，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啟發，所以他寫道：「二十年華識真理，于今雖晚尚非遲」^⑩。周恩來的東渡日本，可能是他有生以來思想受到最大激盪，醞釀轉變的第一個關鍵。

民國八年四月正是櫻花盛開的季節，周恩來因日本難以久留，便束裝返國，不久即趕上五四運動爆發。回國後的周恩來因張伯苓的關係，謀得一份校長室秘書的工作，張校長並允諾他將來入南開大學就讀^⑪。這時他天天到南開去，全力投入轟

⑦ 胡華等，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頁一〇。

⑧ 這五個人可能是嚴智開（南開創辦人嚴修之第七子，習美術）、蔡時杰（東北人，周之同班同學，預備報考士官學校）、張瑞峯（早稻田大學學生）以及韓姓夫婦（京都大學）。參閱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六；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頁二四；Kai-yu Hsu, Chou En-lai, China's Gray Eminence (Doubleday & Company, New York, 1968), p. 236, Note 5.

⑨ 「新中學會」由南開畢業留日學生童冠賢、高仁山、劉東美、陳鐵卿、楊伯安等人發起，於民國元年暑假後創立，以聯絡感情，砥礪品行，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為宗旨。初時會員以留日學生為主，就中以出身天津南開中學、天津法政學校的同學為多，後來逐漸發展到國內各學校，甚至包括留學美、英、法、德各國的學生。參閱楊扶青等，新中學會紀要。收於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續，頁四六〇～六七。

⑩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二三。

⑪ Kai-yu Hsu, Chou En-lai, p. 22.

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參加開會，連絡同學，並與天津學聯負責人馬駿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自任主編，目的在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陰謀，鼓吹愛國思想，並聲援各地的學生和羣眾運動。

民國八年九月，周又聯合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等人成立「覺悟社」，認為社會的進步，首在建立個人自覺，要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②。覺悟社成立時，社員共有二十人，男女各半，都是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男女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社員用抽籤辦法以代號取名，例如周恩來為五號，取名伍豪，鄧穎超是一號筆名就叫逸豪。覺悟社出版過一種不定期刊物——「覺悟」，它原定民國八年十一月五日出版，但因社員忙於學生運動以及印刷的延誤，所以直到民國九年一月二十日始出版第一期。這一期的兩篇重要文章——「覺悟」和「覺悟的宣言」，是經社員集體討論後，由周恩來執筆寫成，表達了覺悟社的宗旨和主張。此外，周恩來還發表了一篇題為「有什麼分別」的短文和「死人的享福」、「游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游圓山公園」、「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後嵐山」等五首白話詩^③。

覺悟社成立後，經常邀請北大教授如錢玄同、周作人等到社談話演講，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釗到天津，曾應邀到覺悟社談話，指導該社的活動，對於該社將不定期出版小冊子的辦法與不分男女的組合，十分贊成，並提出許多的建議^④。這無疑是周恩來與李大釗接觸的開始，當時李大釗在北京先後創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周恩來在赴法前當已有機會參加他們的活動^⑤。

其後，平津的學生運動愈演愈烈，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造成「九一·九事件」，周恩來、郭隆真等四名請願代表至直隸公署請願示威被捕，至七月十七日因律師劉崇佑之營救獲釋，共被扣押半年，在獄中周向難友演講馬克思的學說^⑥，可見他比同儕的信仰要來得狂熱。八月十六日，在周恩來倡導下，覺悟社社員十一人到北京，邀集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曙光社^⑦、人道社等四個團體代表二十

② 覺悟（人民出版社影印，一九八〇），第一期（一九二〇年一月），頁二。

③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一九七九），第二冊，頁二九九～三〇〇。

④ 三個半月的覺悟社，覺悟，第一期，頁八。

⑤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7), pp. 117-118.

⑥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四。

⑦ 曙光社於民國八年十一月在北京成立，成員是北京中國大學、法文專修館和俄文專修館等高等學校的學生。主要活動是出版「曙光」月刊。月刊的編輯是宋介，主要撰稿者有王統照、王晴寬等人。早期的「曙光」雜誌提倡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強調美育是改造社會的根本手段，介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學院氣息。參閱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三冊，頁四九。

餘人在陶然亭開茶話會，商討今後救國運動的方向問題，李大釗曾應邀講話，指出各團體今後應有進一步的聯絡。八月十八日，這五團體在李大釗指導下，於北京大學通信圖書館召開各團體聯絡籌備會。經過討論議決五團體合組一個「改造聯會」，並制定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②。這雖然只是一些空洞的口號，但已可看出五四時代的周恩來，其思想已較前更加開闊，他的活動範圍也已不再侷限於天津一地了。

四、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經過五四的一場風潮，周恩來的思想更為傾向馬克思主義，為了「另闢一條新道路」，他決定到歐洲，於是參加了勤工儉學的行列，搭的幾乎是勤工儉學的最後一班船。旅費是南開創辦人嚴修（範蓀）及天津大律師劉崇祐所贈，兩人各資助五百元的路費^③。

民國九年十一月七日，周由上海搭乘法輪「波爾多斯」（Porthos）號出發，同船有一百九十七人，包括郭隆真、李福景等覺悟社社員或南開同學。十二月十三日抵馬賽^④，旋即乘火車到巴黎，在巴黎住半月有餘後^⑤，於十二月底渡海往英倫，共停留五星期左右。此次周恩來以儉學名義出國，本志在留英，先計劃在英入大學讀書三、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陸遊覽^⑥。抵英後，他與南開同學李福景為爭取官費留英，即與愛丁堡大學交涉入學事，該校許其免去入學試驗，只試英文，但終未進成。原因有二：（一）該校十月開學，試期在九月，而這時才二月，中間尚有六、七月工夫，周不願久待；（二）英倫費用年須二百英鎊，合國幣千元之上，愛丁堡雖較省，亦不止千元，均比法國多出一倍以上^⑦。所以考慮再三，周恩來遂退而求其次回到巴黎學習法文，這個決定影響他一生至深且遠！

周回到法國後，曾在「阿里昂絲法語補習學校」或譯「法語聯合學校」（Alliance Française）補習一段時間的法文，法語自不够用，最後連法國大學的門牆也未摸到。他看書吸收新知，主要依賴英文書，而與第三國際的人士打交道，也多靠

②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八。

③ 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八。

④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頁七七六，八一二。

⑤ 據李璜回憶，民國九年春，於巴黎光明社見一東方美男子（指周恩來）在座。按此時周恩來尚在獄中並未出國，諒係李璜記憶之誤。參閱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頁七六。

⑥ 周恩來致陳式周，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一九八二），續篇，頁七三。

⑦ 同上，頁七四。

英語。他自稱拙於語言的天才，但不自量力的先後學過英文、日文和法文^{④4}。周不必從事體力勞動，故有較多時間以記者身份為天津「益世報」（天主教協會主辦）撰寫「旅歐通信」，而且寫得相當勤快，這也是他生活費用的來源之一。

周恩來在歐洲四年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主要可分成下列三方面加以敘述：

(一) 勤工儉學的波瀾

周在法國先後至少參與過四次政治性集眾示威活動，目的有為勤工儉學生的工學前途，有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其對象名義上雖多半為代表中國政府的官方人員，但也隱含西方帝國主義在內。茲分述如下：

甲、使館請願風潮

由蔡元培、李石曾、吳敬恒等人所發起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至民國十年初已經到達一千六百餘人，適逢法國面臨經濟危機，許多工廠停工，致許多學生「勤工無門」，唯賴華法教育會每天所發五法郎維持費度日。這時蔡元培到法，不但沒有為勤工生帶來好消息，反而一再發表聲明，斷絕與勤工生的一切經濟關係，令學生大起恐慌。國內北洋政府回電亦謂：「現時國庫奇絀，在法學生之無錢無工者，惟有將其分別遣送回國，並責成公使館辦理」^{④5}，對絕望之人更有如晴天霹靂，遂激發極端不贊成勤工之學生將於二月二十八日聚集大隊至公使館請願之事。

當此時機緊迫之際，旅法的國際和平促進會、北大留法同學會、中國化學研究社、少年中國學會分會、巴黎通信社、旅歐周刊社等六團體出面調停，於二月二十六日派代表兩人往公使館向陳鎭公使要求臨時維持辦法，其談判結果有二：(一)現時在校同學，公使擔任暫時維持，各校長決無令其出校之情事，倘有此種情事，可詢問公使館；(二)候工同學亦允暫時入校，與現時在校同學一律，但須三、四日之布置，方可實行^{④6}。

二十七日晨，既到巴黎學生及各地代表開會討論第三者談判之結果。會議結果，以為使館既不能不維持，正可趁勢再為要求，其所要求之條件，即請使館向政府請求每人每月給四百佛郎，以四年為限；及里大、比大無條件開放，任學生自由入校^{④7}。代表會為廣泛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並向全體勤工儉學同學發出通告，向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發出請願書，向旅法上層人物發出請求援助書，向北洋政府和各

^{④4} 同前註。

^{④5} 周恩來，旅歐通信（北京，一九七九），頁二二。

^{④6} 同上，頁二三。

^{④7} 同前註。

省政府發出電報^⑧。

二月二十八日晨，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在巴黎示威遊行，並推派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等十人代表晉見公使陳鑑請願，要求解決工作、求學、發放救濟金等問題。陳鑑謂使館無權應允，遂與留歐學生監督高魯及巴黎副領事李駿親赴使館附近之花園，向等候之學生說明，雙方爭持再三，不能解決問題，公使身陷重圍，最後引起法警干涉，卒以暴力驅散同學，代表在使館者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挾之出，結果有數人受傷^⑨，廣東學生王木因跳電車跌倒，為車輾斃，肝腸斷裂，死狀極慘^⑩，屍體為法警拾去，次日，勤工儉學同人路經其地，見血堆中有殘肝兩片，特拾起貯酒精瓶中，以為請願之紀念^⑪。

「二八事件」的主要領導人是新民學會的一羣，如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人。周恩來留法較晚，又二月中旬始從倫敦回到法國，在巴黎近郊的哥倫布 (La Garenne-Colombes)居住，一面到市區阿里昂絲法語補習學校學法文，一面以記者身份繼續為天津「益世報」撰寫通訊^⑫。故前面學生代表自一月起與使館間的種種交涉，他均未及參加。但他可能趕上了二月二十七日在巴黎一家咖啡館所召開的勤工儉學生代表大會^⑬，這次大會決定了第二天向公使館的羣眾請願。總之，周雖不是這次使館請願風潮的主角，但他關心勤工生的前途，始終注意整個事件的發展，則不待言。事後，他曾撰寫一篇長達兩萬多字的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在「益世報」發表，詳細報導事件的來龍去脈，是同類報導中最完整詳盡，並具議論分析性者。使館請願風潮，可以說是周恩來介入勤工儉學運動的先聲。

乙、拒款運動

民國十年六月，北洋政府特派專使朱啟鈴、財政次長吳鼎昌到巴黎，據巴黎學界瞭解，表面上是代表總統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真正的使命是向法國借款三到五億法郎，名義是救災，其實是購買軍火等用途^⑭。借款條件

⑧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參閱「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一九七九）上冊，頁一一六。

⑨ 有關「二八事件」經過，各方因立場不同，說法不一。茲綜合李維漢、周恩來、盛成、天一等人說法，作一較客觀之敘述。

⑩ 旅歐週刊，第六十九期，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二日，頁三。

⑪ 農報，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二冊上，頁四三〇。

⑫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九。

⑬ 另一說，周恩來在「二八運動」時不在法國，他是事件發生之後才從英國返回巴黎。參閱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一九八一），頁六八。

⑭ 據朱啟鈴事後應時報訪問表示，吳鼎昌受王克敏之囑，赴法接洽。當時中法實業銀行，基礎動搖，法國方面希望中國政府發行三萬五千萬佛郎之國庫券為之維持，並允由中法實業銀行，供給借款五千萬佛郎於中政府，以為交換條件。參閱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五一五。

以全國印花稅、驗契稅作抵押，以滇渝鐵路建築權、全國實業購料權作交換。消息傳出後，旅法學生與僑胞莫不義憤填膺，華工會、中國留法學生聯合會、國際和平促進會、亞東問題研究會、巴黎通信社、旅歐周刊社等六團體遂成立「拒款委員會」，從事拒款的各項努力。拒款運動於六月二十二日展開，其時所進行之方法大略如下：

1. 通電國內，電文如次：

「申報轉各報館各團體鑒：朱啟鈴、吳鼎昌在法秘密借款三萬萬佛郎，條件嚴酷，旅法工商學界一致反對，望國人極力抗爭。旅法各界六千餘人同叩。」

2. 散布傳單，內容大都為報告每日間所進行之事實及拒款之情形。散布地點除巴黎外，且向在法之各地學校、工場及商店之僑胞投遞。

3. 以法文宣言送達法國國會議員、國務員、各報館及各重要人物，約一千餘份。「拒款委員會」所辦之事，以此項最為得力，巴黎報紙除登載全文外，且有附以評語者。

4. 致函詰陳篠公使，內容有「先生負外交重責，代表國家，宜有所表示」之要求。陳氏復函謂，此事出於誤會，請派代表至公使館面談，解釋一切。

5. 發通告致國內各團體及美洲、南洋華僑、留英留德學生會，勸其一致力爭。

6. 致函質問吳鼎昌，其函如下：

「知公在巴黎又密謀借款，希圖賣國，今請明告公，公如自愛，可速將此事打消，並即離歐，否則上天入地，必有人與公相見。」^{④5}

「拒款委員會」先後於六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廳(Société Savante)召開兩次「拒款大會」，通過「拒款宣言」，宣讀周恩來所起草的借款真相的調查報告。在八月十三日的拒款大會中，陳篠公使不敢來，而派一等秘書王曾思代表解釋，力言借款簽字之說，實屬毫無根據，公使館始終未與聞其事，且法報之登載亦未嘗見。言時頗怒形於色，似怪同胞開會為多事，又時復以拳擊案，表示其不滿，致遭滿腔義憤之羣眾毆打。迨會場平靜後，張君勵起而質問，並提出兩條辦法，請眾討論：(一)應請公使即向法政府聲明，反對此次借款，並向法國各報要求更正，並無簽字草約之事，若借款仍然成立，公使及全館職員均應辭職，以謝國人；(二)以後凡關於中法借款之事，應交由留法各界所組織之外交委員會審議，得其同意，方能執行。是議提出後，經與會人多數通過，王秘書亦鼓掌贊成，當即照原議繕寫兩

^{④5} 旅歐週刊，第九十一期，借款專號，頁一；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一九七九），頁八〇～八一。

份，一份由王秘書當眾簽字，一份帶交陳公使簽字後，於一週內寄交委員會。當場並推舉袁子貞、謝東發、毛以亨、李書華、徐特立、李光宇、宋紹景、張君勸、李哲生、曾琦十人為臨時委員^⑥，至此，反對中法秘密大借款的奮鬥延續了兩個多月後宣告勝利結束。

這次拒款運動，旅法華人不論華工或學者學生，不分黨派，都一致聯合參加，故聲勢浩大，不單是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領導功勞。不過，周恩來的地位比上次「二八運動」重要，他雖未被推舉為十人委員之一，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共黨份子中應僅次於擔任大會主席的趙世炎，他一開始即密切注視事件的發展，接連撰寫「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訊」等多篇通訊，揭露北洋政府與法國政府之間的交易，使秘密借款提前曝光，終告流產。

拒款運動的主要對象雖是代表北洋政府的吳鼎昌和陳鎭等人，但卻連帶惱怒了法國資本家及外交部，大大損害法國在遠東的利益。因此，由法國教育、外交當局結合實業界所組成，旨在救濟勤工儉學生的「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乃宣布停發維持費^⑦，使勤工生走投無路，剩下佔據里大一途了。

丙、進駐里大事件

里昂中法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年秋天，為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一批稍早鼓吹勤工儉學的人，與里昂當地熱心中法教育人士所共同創辦的一所海外中國大學，其目的在以比較經濟的組織，利用國立里昂大學及其他各專門學校現成之設備與師資，為我國作育有志深造之人才^⑧。當消息傳出，勤工儉學生奔走相告，無不喜形於色，以為大家有了求學的出路。不料學校一成立，吳稚暉校長另從國內北平、上海、廣州等地招收一百多名「新科貴人」前來，捨近求遠，棄勤工生於不顧。此時勤工生的維持費又停發，他們在希望幻滅下，只好铤而走險，提出「誓死爭回里大」等口號，並在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人的領導下，派出先遣隊一百二十名左右，進佔里大校舍，結果被法國警方以「強佔校舍，擾亂治安」等罪名拘

^⑥ 周恩來，旅歐通信，頁一四三。

^⑦ 同前註，頁三一。

^⑧ 有關里昂大學的創辦情形，請參閱拙著，民初旅歐教育的艱難歷程——里昂中法大學初探（一九二一～一九四八），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出版），下冊，頁九九一～一〇〇六。

禁二十餘天後，集體遣送回國^⑨。

周恩來一開始即參與這次的行動，但他處事比較穩健謹慎。當各地勤工儉學生聯合委員會決定採取直接行動時，他提醒大家鬭爭是複雜的，鬭爭要講究戰略，要作兩手準備，故建議留下部份幹部負責後方工作^⑩，因此他和其餘幾位留駐巴黎的代表——聶榮臻、王若飛、徐特立沒有被一網打盡，事後得以四處奔走，進行營救。留巴代表曾往見陳鑑，要求三事：(一)拍電安慰被拘同學；(二)用電話請吳稚暉速來巴黎，商定根本解決的事；(三)嚴重向法政府交涉恢復學生自由，即不能立時全體釋放，亦請先放十代表，好與吳稚暉到巴黎磋商一切辦法。第三者方面有石英、黃齊生兩人出面調解^⑪，但仍無法挽回一百餘位肇事者被遣送歸國的命運！

丁、反對列強之共管中國鐵路

列強共管中國鐵路之說，哄傳中外已久，惟自民國十二年五月發生山東臨城刦車事件後，乃有進而見諸實行之勢。七月二日，巴黎時報載：列強大多數已同意於在華設立萬國警察共同管理中國鐵路之議，不久即將見諸實行云。旅法華人聞訊，無不憤慨！是日下午，即由旅法華工總會、華法教育會、北大同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商議先行發起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以謀應付一切。次日下午四時，在華僑協社開旅法各團體聯合會發起會，計到會之團體代表有：(一)「先聲週報」社梁志尹、林秉照；(二)北大同學會許德珩、周炳琳；(三)旅法華工總會袁子貞；(四)「少年」雜誌社周恩來；(五)少年中國學會曾琦、李璜、陳登恪、黃仲蘇、余家菊；(六)女子勤工儉學會郭隆真；(七)華法教育會何魯之；(八)湖南學生會徐特立。由何魯之任主席，提出預擬之六條辦法如下：

(一)請公使向法政府正式聲明，華人誓不承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

(二)向法報宣言，解釋內亂之原因，申明反對共管之理由；

(三)警告國內各界，速起組織國民政府，反對鐵路共管；

(四)招待法報記者；

(五)致函留英、美、日、俄、德諸國華人，請其一致行動；

(六)致函駐英、美諸國公使，請其設法打銷此議。

主席提出之後，由曾琦起而說明其理由，經眾逐條通過，並決定於七月八日在

⑨ 有關進佔里大事件，請參閱拙著，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頁七八～八〇。

⑩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五八。

⑪ 周恩來，旅歐通信，頁五五～五六。

巴黎先開旅法各團體聯合會成立會，十五日再召集旅法華人全體大會。三日在協社會議之後，遂由是日到會之八團體及留法勤工儉學總會署名，發出通告，召集其他未加入之各團體，於八日午後三時，在巴黎中華飯店開正式會議。是日到會之團體代表，較前增加，計有：(一)華法教育會何魯之；(二)四川勤工儉學會吳從龍、劉一；(三)江蘇勤工儉學會吳琪、吳琢之；(四)湖南學生會徐特立；(五)旅歐中華航空學會吳家籌；(六)江西學生會蕭健、彭樹敏；(七)旅法華工總會袁子貞；(八)「工人旬報」社王子卿；(九)北大同學會許德珩、周炳琳、陳沛、高維；(十)安徽學生會江世義；(十一)巴爾敘伯中國同學會曾向午；(十二)廣東半官費學生會胡國偉、梁志尹；(十三)「少年」雜誌社任卓宣、周恩來、尹寬；(十四)「先聲」週報社黃晃、馮葉恭；(十五)少年中國學會曾琦、李璜、陳登恪；(十六)留法勤工儉學總會周楚善；(十七)「工餘」雜誌社李卓；(十八)巴黎十五區電話廠勤工儉學分會勝功成；(十九)學生總會周刊社陸宅樞；(二十)河南學生會楊介臣；(二十一)華工組合書記部蕭樸生、汪澤楷；(二十二)山西同學會令狐國光。

是日會議，仍由何魯之主席，議決之事如下：

- (一)通過三日八團體所擬之六條辦法；
- (二)通過曾琦起草之致國內各界電文；
- (三)決定十五日在巴黎召集旅法華人全體大會；
- (四)組織臨時委員會，推舉職員如下：

法文書記：謝東發、李璜

中文書記：周恩來、曾琦

會計：徐特立、袁子貞

招待：魯觀成、徐特立、李不謙、吳家籌[◎]

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旅法各團體於巴黎社會博物館召開旅法全體華人「反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大會」。是日天氣雖雨，到會者仍有四、五百人之多。首由何魯之主席，述開會理由，次請曾琦報告籌備大會之經過，及國際共管之由來，為抵抗列強與掃除國賊，籲眾實行四大運動：(一)輿論運動；(二)羣眾運動；(三)革命運動；(四)暗殺運動[◎]。繼由周恩來報告其起草「告國內父老書」之理由，略謂：國事敗壞至今，純由吾人受二重之壓迫，即內有冥頑不靈之軍閥，外有資本主義之列強。吾人欲圖自救，必須推翻國內軍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

◎ 「少年中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上海中華書局發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影印）第四卷第八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附錄二，旅法華人反對共管中國鐵路紀事，頁一~二。

◎ 曾慕韓（琦）先生年譜日記（中國青年黨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出版），頁五四。

是晚各團體代表，復開會議於巴黎一大咖啡店，討論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之宗旨及組織，並另選正式委員。關於宗旨一條，曾琦提議以「聯合中國旅法各團體，實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宗旨，結果經大多數通過。組織則分書記、經濟、庶務、交際、新聞五股，書記股，設中文書記三人，法文書記二人，曾琦、周恩來當選為中文股書記委員^{⑤1}。

七月三十一日，「旅法各團體聯合委員會」在巴黎萬花酒樓舉行記者招待會。巴黎二十四家報館三十餘名記者及有關人士均應邀出席，對旅法華人反對帝國主義共管中國鐵路的奮鬥深表同情。翌日，法國各報或發表紀事或發表評論，紛紛表示支持旅法華人的愛國行動。

旅法華人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舉動，主要由少年中國學會會友如何魯之、李璜、曾琦等人所發起，但為示團結一致，不分彼此，亦約周恩來等人參加。曾琦雖被推舉為「告全國父老書」及「致駐法國的各國公使反對鐵路國際共管的公函」的起草人，但他特別提議要與周恩來共同商酌，以安周之心，且示並無排斥之意^{⑤2}。惟這時「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已成立有年，他們假借愛國名義，在羣眾大會上宣傳共產主義。例如在七月十五日的大會上，周恩來的一席話，無異在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主張用革命暴力和統一戰線實現上述目標^{⑤3}。劉清揚先引述某領事私人談話，謂中國現狀如此混沌，非借外人的勢力來壓迫一番，中國國民是永遠不會覺悟的。次說救國方法，大意謂五四之救國運動是盲目的，惟有共產主義的革命才算是真正的救國運動^{⑤4}，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非聯合蘇俄，不足以言革命救國^{⑤5}。後來會場秩序大亂，甚至發生鬭毆，啟開了日後與中國青年黨間進一步的流血衝突。

（二）中共旅歐組織的發展

在中共組織未正式成立前，法國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團體有三：（一）是由蔡和森所領導，以蒙達集（Montargis）為大本營的新民學會，至民國九年六月已有會員十六人。七月初旬，新民會友在蒙達集舉行一次聚會，確立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逐漸走上俄國革命的道路^{⑤6}；（二）是李維漢、李富春等人所領導組織的「工學勵進會」，後改稱「工學世界社」，有社員三十多人，民國九年九、十月

⑤1 「少年中國」，第四卷，第八期，附錄二，頁五～六。

⑤2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九四。

⑤3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六。

⑤4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七七五。

⑤5 李璜，前引書，頁九五。

⑤6 參閱陳三井，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頁七五～七六。

間，該社在蒙達集開會三天，經過熱烈討論後，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宗旨^{⑥0}。(三)是趙世炎、李隆郅(立三)為首的「勞動學會」，他們在使館請願風潮發生後，仍相信勤工儉學主義，反對蔡和森依賴維持費為生，拒絕勤工的主張。於是他們發起建立「勤工儉學者同盟」，獲得熱烈響應，使人數由十餘人增至二百餘人。他們又與同情勤工儉學的人重組「留法勤工儉學會」，在民國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其宗旨為「本工學主義及互助精神，實行勤工儉學以謀社會之改進，而勞動與互助為勤工儉學會會員共同的信條」^{⑥1}。該會並動員了許多勤工生入廠工作，大部份集中在克魯鄉(Le Creusot)工廠區。但由於客觀事實的困難——工廠停工，有工作者終居少數——主張勤工者在工作上體驗到勤工的困難，於是與「反對勤工者」漸漸了解而取得一致的態度。從克魯鄉區的勤工生首先倡議開放里大，可以看出勤工理論的支持者已放棄勤工，轉而在求學方面尋求自己的出路。所以勞動學會、留法勤工儉學會和工學世界社終於合流起來，在進佔里大事件中遂取一致的行動^{⑥2}。易言之，勤工派最後亦改弦更張，與蒙達集的新民學會與工學世界社等「革命派」，同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共旅歐組織的發展，依其時間先後，大致可分下列三個階段加以敍述：

甲、共產黨小組

大約在民國十年三月間成立，該小組之成立應在「二八運動」之後，比北京、上海的共黨小組為晚。據張申府(崧年)自述，小組以他為中心進行聯繫，與陳獨秀常有書信來往^{⑥3}。按張原為北大講師，與陳獨秀、李大釗為共黨北京小組的三個最早成員，後來應里昂中法大學之聘，與蔡元培、陳大齊於民國九年十一月中旬同船出國，陳氏係往瑞士研究實驗心理學，張君係到里昂幫理大學事務^{⑥4}。同年年底到法國後，因里昂中法大學(中國學院)正在籌建，未正式開學，張申府即在巴黎住下，首先介紹在國內已經認識的劉清揚入黨，接著透過劉清揚的關係介紹周恩來入黨(張自稱在民國九年八月的北京陶然亭茶會上已認識周，但可能不如對劉熟悉)。同時又與原為上海小組成員的趙世炎、陳公培取得聯繫，於是這五人就在巴黎成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沒有別的稱呼，對外也不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民國十年七月，當中共「一大」要在上海召開前，曾接到國內寄來通知，也提出在黨小

⑥0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頁一一五。

⑥1 張伯簡，勤工儉學變遷略史，「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一冊，頁一一九。

⑥2 陳敬堂，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東亞季刊十六卷一期(民國七十三年七月)，頁四二。

⑥3 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八七。

⑥4 旅歐週刊，第六十一期(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頁三。

組討論，後因時間緊迫，路遠（恐怕路費也有問題），未能參加[◎]。所以法國黨員雖比日本為多，當時卻沒有派代表回國參加「一大」的成立。

巴黎共產黨小組雖然成立，但並無實際工作表現。學者氣味濃厚的張申府既非實幹者，也不熱心參與活動，所以小組名存實亡，在以後的拒款、里大事件兩大風潮中，小組成員趙世炎、周恩來毋寧是以個人身份，積極扮演了領導的角色。

乙、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除共產黨五人小組外，最熱心組黨者應首推新民學會的領導人蔡和森。早在民國九年七月的蒙達集會議上，蔡和森即主張要組織一個「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共產黨」[◎]，其後透過各種活動的經常接觸，蔡和森與非新民會友的趙世炎和周恩來，對組黨問題也有所計議。民國十年「二八事件」後的某一星期天，蔡和森和周恩來登上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塔頂，在暮色蒼茫中，二人討論建黨之事，周恩來說：「當前最具體的問題，就是我們首先要組織共產主義團體，這是最急的要事」[◎]。組黨之事後因里大事件，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大部分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幹部被遣回而中斷。

就周恩來而言，他到法後常與趙世炎等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經過對各種主義反復推究比較以及和同志間的多次討論，「思想本來未大定」，對主義認清較晚的周恩來終於民國十年十月（抵法一年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他曾鄭重的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又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民國十一年三月，周恩來移居德國柏林，這時旅歐黨小組成員最多不過十人，大都集中在德國。他們鑒於勤工儉學生和旅法華工的分散各地與不團結，都認為有儘快組成青年團的必要。於是周恩來、張申府、張伯簡、劉清揚等七個黨員聯名寫信給趙世炎，「促於五一告成」籌建工作。趙世炎為此立即離開他工作了半年的法國北方，於五一勞動節那天回到巴黎，隨即奔走於蒙達集、里昂等地以統一意見，

[◎] 同註[◎]。

[◎] 蔡林彬給毛澤東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一九八〇），頁五二。

[◎] 蔡和森文集，頁八三九。

[◎] 「伍的誓詞」，原載天津「新民意報」副刊「覺郵」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收於「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天津一九七九），頁二七〇。

[◎] 「西歐的『赤』況」，原載「覺郵」第二期，收於「周恩來同志歐旅文集」，頁二七五。

[◎] 同註[◎]。

至五月底始籌備就緒^①。

民國十一年六月間，在巴黎西郊的布隆恩（Boulogne）森林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有法、德、比等國代表共十八人，周恩來由柏林前往參加。會議決定將團組織定名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通過了章程和工作計劃，並選舉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會議還決定出版刊物「少年」。討論章程時，周恩來提議加入組織者應當宣誓，有人反對，認為這是宗教色彩。周恩來解釋說，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帶有政治約束力，譬如袁世凱曾經宣誓忠於民國，但他以後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而討伐他^②。其後又增補王若飛、陳延年、尹寬三人為執行委員^③。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本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經趙世炎等爭取後也陸續加入該組織^④。少共在性質上是團的組織，而不是黨的組織。

同年十一月下旬，旅歐少共派李維漢攜帶公函歸國，向團中央匯報工作，並聲明「願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之部」，經中共中央同意，於是少共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於巴黎郊外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進行改組。這時旅歐青年團的團員已由原來的三十餘人發展至七十二人。（計法五十八人，德八人，比六人）。出席代表四十二人，會議由趙世炎任主席，任卓宣等四人為記錄。會議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並將原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會上並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章程第一條明確規定，凡申請入會者必須做到「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⑤。大會並選出周恩來、任卓宣、尹寬、汪澤楷、蕭樸生五人為新的執行委員，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三人為候補委員。執行委員會成立後，推選周恩來為書記，尹寬主任「共產主義研究會」事，汪澤楷主任「學生運動委員會」事，蕭樸生主任「華工運動委員會」事，任卓宣主任「出版委員會」事^⑥。至十四年初，該團發展為三百餘人，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至同年底，又因團員陸續赴俄或歸國減少到一百餘人，組織便相應地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地方團」^⑦。

①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三六。

②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六六～六七。

③ 同註①。

④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頁一二〇。

⑤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收於「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八四九。

⑥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報告第一號，「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八四六～八四七。

⑦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三七～三八。

丙、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由於少共在性質上不是黨的組織，所以在民國十一年冬，已參加少共的中共黨員另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⑧，周恩來為支部負責人之一。支部下設法國、德國、比利時三小組，茲誌其負責人與重要黨員如下：

法國組——負責人為趙世炎；黨員有傅鍾、王若飛、李富春、陳延年、陳喬年、李林、任卓宣、鄧小平、劉伯堅、林蔚、郭隆真、余立業、蕭樸生、袁子貞、馬志遠、陳彭年、何長工、李季達、冉鈞^⑨。

德國組——負責人為張申府；黨員有周恩來、朱德、張伯簡、鄭太樸、高語罕、李季、孫炳文、熊雄、章伯鈞、謝壽康、廖煥星^⑩。

比利時組——起初負責人為劉伯堅與聶榮臻，後來是江澤民。黨員有熊味根、黃士韜、甘瑞、張貴元、喬丕成、喬丕顯、萬監周、張熙等人^⑪。

中共旅歐支部在組織上是保密的，對外一切活動，都用旅歐共青團的名義出現，即使對共青團也不完全公開。黨支部和少共機關都設在巴黎十三區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旅館裏。當時黨支部和少共機關是重合的，黨員都參加少共組織活動，少共中具備黨員條件的則不斷轉為中共黨員^⑫。

綜上所述，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最早領導人是張申府、趙世炎；民國十二年他們離開後，即交由周恩來負責；民國十三年八月，周回國後，則交由鄧小平、傅鍾、任卓宣等人負責。

周恩來旅歐期間，除促成中共組織的成立和發展外，尚有二事值得一提：（一）他經常奔走於德、比、法之間^⑬，介紹中國學生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幫忙辦理去蘇聯的各項手續，並安排他們的行程。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十二年三月，有趙世炎、

⑧ 據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江澤民《參加留法比勤工儉學的回憶》、施益生《回憶中共旅歐支部的光輝業績》，以上均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等人說法，中共旅歐黨組織的名稱為「支部」，各地設小組。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陳敬堂（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等人則有總部，總支部下設支部之說，恐係與少共組織混淆之誤。

⑨ 名單不完全，主要根據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一文而得。

⑩ 名單不完全，主要根據張申府前述談話而得。

⑪ 名單可能與共青團相重，主要根據江澤民的回憶而得。

⑫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頁七一。

⑬ 周恩來與第三國際間的來往（包括經費問題），乃至中共與法共及胡志明之間的關係，始終曖昧不明，由於資料所限，本文不擬探討。但可參閱 Annie Kriegel, Aux Origines Franscaises du Communisme Chinois, Preuves, 209-210, aout-sept, 1968.; Nora Wang, Den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pp. 698-705.

王若飛、陳延平、陳喬年、余立業、高風、陳九鼎、王凌漢、鄭超麟、袁慶雲、王圭、熊雄等十二人第一批前往莫斯科。同年十一月，劉伯堅、尹寬等亦繼之前往。十三年九、十月間赴莫斯科的有聶榮臻、蔡暢、穆清、傅烈、錢來杰、陳家珍、彭樹敏等二十餘人，同年底又有李富春等人^④。(二)在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尹寬、林蔚等三人代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到里昂與國民黨總部代表王京岐商談國共合作問題。王京岐，浙江嵊縣人，民國十年因參加里大事件而被遣送回國，民國十一年重新到法國，他在上海準備出國時，曾訪謁孫中山先生於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國國民黨駐滬辦事處。中山先生當面指示王京岐到法國後聯絡同志組織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⑤。雙方達成協議，決定共青團員八十餘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積極進行國民黨旅歐支部的籌建工作。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駐歐支部在里昂召開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表演說，並當選為國民黨駐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其後在執行部長王京岐回國述職期間，周恩來曾代行其職務^⑥。

(三)對外思想鬭爭

中共旅歐組織一旦建立，一方面出版刊物以學習和宣傳共產主義，一方面為了影響與爭取廣大的華工與勤工生，因此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已存在的一些團體發生思想上之鬭爭，甚至行動之衝突。其中最重要的鬭爭對象，早期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公教青年會，後期則為中國青年黨。茲分述如下：

甲、「少年」與「工餘」的對抗

「工餘社」是旅法華工和勤工儉學生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組織的小團體，成立年月不詳^⑦，其主要成員有華林（李合林）、陳延年、陳喬年、陳澤孚、畢修勺、朱洗、孟稜崖、李卓等人^⑧。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五日，該社出版了一種油印月刊——工餘，由李卓編輯，前後共出二十三期，歷時三年半，至民國十四年十月，始與另一無政府主義刊物「自由人」合併^⑨。無政府主義主張摒棄一切國家政權，主張絕對自由，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建立政黨的必要，並把工人運動限制在經濟鬭爭的範圍^⑩。因此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

^④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五六～五七。

^⑤ 吳琪，周恩來同志青年時代在法德兩國的革命活動，參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四二。

^⑥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七。

^⑦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四冊，頁二〇九。

^⑧ 吳琪，前引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四四。

^⑨ 同註^⑩。

^⑩ 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一九六三），頁四三。

關刊物——「少年」，發生激烈的衝突。

「少年」創刊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一日，編輯所設在巴黎十三區那家兼做黨團機關的小旅館裏，由後來加入少共的陳延年、陳喬年負責刻寫蠟板和油印。「少年」是月刊，紅色封面，十六開本，每期三十餘頁，中間曾停刊過兩個月，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復刊出版第七號，改為二十四開本，四十二頁，通信處改為巴黎西郊華僑協社轉交。自第十號起又改為不定期刊^①。

「少年」的主要內容在宣傳共產主義，論證中國走共產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也用許多篇幅與無政府主義作理論鬭爭。首先，周恩來（筆名伍豪）在第二號上發表「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指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已有了十年以上的歷史，他利用中國人的惰性和容忍，竟與些思想墮落者結成了不解之緣。他們都自命為提倡科學的人，其實他們只會高談那空想的藝術。高談幾個「真」、「善」、「美」的名詞，論到實在的開發實業的方法，恐怕除掉毀壞大規模生產，反對集中制度外，竟無什麼具體主張，……無政府主義既這樣空洞，所以具有無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認為無政府黨人的李石曾、吳稚暉輩一遇到當前的政治經濟問題，才會手忙腳亂，弄出與無政府主義相反的主張出來。」^②

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論爭的焦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工餘」發表了很多反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奪取政權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的論說。針對這種情況，「少年」發表了「一個無政府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的說話」（第七、八、十、十一號連載）、「什麼是無政府黨人的道德？」（第十一、十二號連載）和「工人與政治」（第十號）等文章，對「工餘」的論點予以還擊^③。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少年」第六號出版，周恩來發表「俄國革命失敗了嗎？——質工餘社三泊君」一文，針對無政府主義者三泊在「工餘」第九號發表的「俄國共產主義失敗之原因及其補救的方法」一文中對俄國革命五年來成就的否定和對新經濟政策的批評，進行了反駁^④。

乙、「少年」對天主教的攻擊

在比利時有位雷鳴遠神父 (Père Vincent Lebbe)，曾於一八九五年來華，一九一二年出任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還創辦了天津「益世報」。他在中國停留多

①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一九五九），第二冊，頁三九。

② 伍豪，共產主義與中國，原刊「少年」第二號，收入「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頁二三三。

③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四〇。

④ 同前註，頁四一。

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雷神父在布魯塞爾設立有「中國學生公教家庭」，以爲勤工儉學生介紹工作、介紹入學或向富人募捐以救濟勤工儉學生等名義，拉攏勤工儉學生信仰天主教。雷鳴遠曾經領着他們向天主祈禱：「俄羅斯已經進入地獄了，求求天主使中國倖免於共產主義的災難吧！」希望「天主挽救中國」，使中國免遭革命的衝擊，把共產主義思想當做洪水猛獸加以撲滅^⑤。

雷鳴遠神父的救濟勤工儉學生和反共做法，自然觸怒了這一批宣傳共產主義的激進者。他所辦的「青年會星期報」，被認爲「猖狂惑眾」，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出版刊物——工餘，同樣構成共產主義的宣傳障礙^⑥，都是打擊的對象。因此早在「少年」第二號，周恩來即發表「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一文，明白攻擊天主教，認爲「宗教是人類中的一種毒藥」，共產主義者對此種「犧牲弱者庇護強者，長人依賴性，誘人容忍，錮禁思想的宗教深惡痛絕」^⑦。

民國十二年的夏季，歐洲曾發生一起中國學生上書羅馬教皇的趣劇。有三十二名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名給羅馬教皇寫信，請求教皇批准原海軍艦長，寄居中國多年而又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神父若利葉等數人，到中國去創立本篤修會。經「赤光」（「少年」改名）披露雷鳴遠事前寫給那些中國學生的密信，始知中國學生上書羅馬教皇之事，只不過是神父雷鳴遠一手策劃和導演的結果。「赤光」以「羅拜在羅馬教皇腳下的中國學生」爲題，唾罵這些因「不堪生活壓迫而跑到法、比資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神父雷鳴遠跟前討飯吃的中國學生」是「無恥之尤」，並辱罵雷鳴遠爲「無恥的宗教徒」，認爲他的假借「留歐中國學生名義」上書教皇，是一件「令人髮指」的事情^⑧。

丙、「赤光」與「先聲」的論戰

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理論的「少年」改組爲實際的「赤光」，標榜唯一目標在「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⑨。周恩來爲「赤光」撰寫的文章甚多，平均每期刊載四、五篇，主要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和軍閥禍國殃民的罪行，在此值得一述的是參加了「赤光」與「先聲」的論戰。

⑤ 參閱江澤民，參加留法比勤工儉學的回憶；陳崇山，雷鳴遠破壞勤工儉學運動。以上兩文俱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

⑥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報告第一號，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八四五。

⑦ 伍豪，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原刊「少年」第二號，收於「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三冊，頁二七九～二八四。

⑧ 赤光第三期（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頁八～九。

⑨ 「赤光的宣言」，赤光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頁一。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曾琦、李璜、何魯之、張子柱、李不韙，胡國偉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國青年黨，是即國家主義派。他們以「先聲」週報（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創刊）為據點，標榜反共、反蘇、反對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等口號，而與共黨展開論戰。茲將周恩來在「赤光」上所發表的相關文章篇名及主要內容列舉如下：

期 別	署 名	篇 名	主 要 內 容
三	伍 豪	救國運動與愛國主義	指出「救國運動」與國家主義派狹義的愛國主義運動本質有別。
七	伍 豪	實話的反感	嘲弄一般國家主義者有時因過分愛國，便要抹煞真理。
八	恩 來	航空學會的害羣之馬	指出周培超（周道）為張作霖的走狗當翻譯
九	恩 來	再論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問題	答「先聲報」胡瑞圖、吳樵甫、戚重三君針對國家主義派攻擊國共合作的論點加以反駁。
九	恩 來	共管中國江河的新形勢	指責自稱愛國的國家主義派老強調反蘇，對列強共管中國無動於衷。
十	恩 來	為周道事答湖南學生會書	答覆湖南留法勤王儉學學生會刊於「先聲報」的公開信。

此外，林蔚撰「批評曾琦君底神聖聯合與統一前敵」（七期）、「到底不愧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九期），任卓宣撰「什麼叫造謠中傷」（九期）、「你們就會學像了曾琦」（十七期）、「哈哈！同床異夢！」（十八期）、「斥反革命的青年黨人對於孫中山之矛盾論調」（廿八期）、「斥反革命的國民黨右派份子對於 孫中山之背叛行為」（廿八期），輝暉撰「青年黨之與教徒軍閥和帝國主義」（十七期），少元撰「好利害的反革命報紙啊！」（十七期），鄧小平（希賢）寫「請看反革命的青年黨之大肆其捏造」（十八期）、「請看先聲週報之第四批造謠的新聞」（廿一、二期），愚甫寫「青年黨才是陳炯明在法所設立底反革命分部啊！」（十八期），肇樞撰「你們就是『反革命』和『軍閥的走狗』」（廿三期）等，都是與「先聲」直接論戰的激烈文章。經常為「先聲」執筆的有曾琦、李璜、何魯之、張子柱、黃

日光、周宗烈、鄧孝情、王建陌、胡瑞圖、段慎修、胡瑞榮、梁志尹、林秉照、胡國偉等人，雙方由思想上的短兵相接，逐漸引起行動的衝突，最後演成流血鬭爭^⑩。

綜上所述，周恩來在「少年」與「赤光」兩刊的對外論戰中，都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蔡和森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後，周無疑是第一號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其次是任卓宣，至若鄧小平等其餘諸人似不值深論矣！

五、結語

周恩來是一個典型的五四青年，他積極參與學校活動，辦刊物，組織學會，並關心國事，進而熱烈從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學生時代的周恩來，雖然認識李大釗，讀過河上肇的書，並轟轟烈烈的參加過五四運動，但在赴歐之前，他的活動舞臺侷限於天津，與「南陳北李」沒有直接師生關係，無緣積極參與他們所主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社會主義研究會的工作，所以當時的周恩來和一般激進青年一樣，只能算是一個潛在的馬克思主義信徒（Potential Marxist）。他的思想之轉變，乃至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應是抵歐一年期間內研究比較各種主義後的選擇。所以他自稱「先入黨，後信仰」，坦承「認清 cism 甚晚」^⑪。

惟周恩來雖然到歐洲比蔡和森、李維漢、趙世炎等人為遲，認識共產主義也較晚，但憑他個人的優越條件（英文好，文筆不錯，記憶力強，富調和性，具組織能力），卻很快一躍而為旅歐學生界與中共黨團組織的重要領導人物。他天生是一個政治運動家、組織家，也是難得的宣傳家和理論家，因此無論在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發展中共組織，或共黨對外思想鬭爭方面，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有人把留法歸來的中共幹部分為三派，像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屬於衝鋒陷陣型的盲動派；鄧小平、聶榮臻是實際派；周恩來自稱性格上「多畏多慮」^⑫，其人冷靜、溫和，所以是所謂的穩健派。衡諸韋伯（Max Weber）的政治領袖三型

⑩ 關於中國青年黨與共黨論戰衝突的詳情，請參閱：

胡國偉 巴黎心影 臺北菩提文藝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

李璜 學鈍室回憶錄

曾琦 曾慕韓（琦）先生年譜日記

⑪ 「西歐的『赤』況」，原載「覺郵」第二期，收於「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頁二七五。

⑫ 同前註，頁二七一。

——理智(rational)、傳統(traditional)、魅力(charismatic)⑩，周恩來應屬於理智型。不論在旅歐時期的活動或回國以後所從事的工作，周恩來都能把握「因時制宜」的原則，謹慎應付，所以他不像蔡和森、陳毅等人很快遭到法國當局的驅逐，也沒有像任卓宣等人日後在巴黎琅璫入獄。回顧周恩來的一生，大多在從事危險的政治活動，但不管在與對手的談判過程中，或歷經共產黨內無數次的鬭爭風險，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倖免於難⑪，多半應歸功於上述他的這些政治特質。

⑩ Raymond Aron, *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1967), tome III, p. 522; Raymond Aron (Translated by R. Howard & H. Weaver),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Durkheim, Pareto, Weber* (Penguin Books, 1979), Vol. 2, p. 209.

⑪ 若干研究周的學者如李天民等，認為周恩來向來沒有爭取「第一繼承人」的想法，此或為其能「倖免於難」的原因！